

西方文明的文化起源： 从文化借用到文化基因的形成

李新宽

【内容摘要】 西方文明文化基因的形成和塑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1—14 世纪是西方文化基因的雏形阶段，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文化基因的发展阶段，这两个历史阶段都属于文化借用期。西方人大规模借用古希腊的文化概念、文化意象，借用古罗马和拜占庭的法律术语甚至法律体系，借用东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技术文化，通过挪用、吸收、改造和重组这些文化因素，再结合不断演化和再创造的日耳曼传统文化因素，塑造出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个人主义三大文化基因。近代早期是西方文化基因的成熟阶段，也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创造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

【关键词】 西方文明 文化史 文化基因 文化借用

【作者】 李新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上海 20023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早期英国金融创新与资本主义的成长研究”（23ASS002）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蛮族、维京人、阿拉伯人、马扎尔人等一系列外来部族的频繁入侵，给西欧这片西罗马帝国的故土造成了经济上倒退回农本经济、文化上徘徊不前的局面。“西欧与其近邻相比明显落后，技术水平低下，城市小得多，其贵族也远没有那么光鲜和亮丽。”^①正如英国史家 J. M. 罗伯茨所言：“如果和拜占庭和哈里发的帝国相比，易北河以西的欧洲在罗马崩溃后的几百年间几乎是世界历史长河中一潭无足轻重的死水”，孕育中的“新文明只能以野蛮和蒙昧为基础，可以教化和培养的人少之又少，欧洲将长年担当文化引进者的角色”。公元 1100 年“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起步的分水岭；只有此时，我们才能感受到，这片大陆的大片地区脱离了半蒙昧的社会状态，有了自诩为文明的资本。但也仅此而已”。^②因为对西欧而言，9 世纪和 10 世纪的维京人和马扎尔人入侵者是最后的外敌入侵，此后西欧步入了文化、商业和技术发展阶段。^③



微信公众号



西方文明起源于 11、12 世纪,逐渐成为中西方学者的新解。^④西方文明正是在这种贫瘠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先后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通过漫长的历史积累和大规模的文化借用与改造,其文化基因才最终形成。

“文化基因”是一个通过类比生物基因而形成的概念。生物基因拥有系统的结构化遗传法则,文化的传承变异也遵循着类似的谱系,文化基因是文化内涵构成中的一种最基本元素,存在于民族或族群的集体记忆之中,是民族或族群储存特定文化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近年来,随着文明史研究的方兴未艾,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发端与起源多有思考。^⑤华裔加拿大学者梁鹤年著有《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认为“真”与“唯一”、“人”与“个人”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两组基因。^⑥其分析追本溯源,自成体系,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否就是这两组,有待商榷。侯建新教授提出欧洲文明通过采纳和改造不同的文明元素,在中世纪中期确立了文明的“元规则”: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和生命权利,从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⑦这一思考为进一步审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提供了新的视角。西方人之所以会提出并践行“文明冲突论”,而不是“文明和谐共处论”或“文明互鉴交流论”,与西方文明的文化特质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种文化特质又是由文化基因决定的。因此,阐明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对理解西方文明过去、现在的发展历程,对探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向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西方文化基因形成的环境和条件

布罗代尔指出,西方文明是一个“业已经过第二次或第三次发酵”的文明。^⑧对次生文明或再次生文明来说,其文化基因的形成是内部文化因素与外部文化因素的结合与重组,是内部发酵和接触、交流、借鉴的结果。直到 10 世纪左右,西欧在许多方面还相当落后,当时的阿拉伯作家把遇到的欧洲人视为野蛮人,认为其没有能力进行先进的知识活动,一位 10 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认为:“他们躯体庞大,举止粗野,理解力愚钝,语言艰涩难懂……那些属于极北之地的人最是愚蠢、粗鲁和野蛮。”^⑨这样的文化状态表明,在西方文明起源之时,西方区域不但刚刚才在政治上稳定下来,经济上退化到了生存经济,而且文化发展上也乏善可陈。要酝酿形成一个具有全新文化基因的文明,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只有依靠自身积累和文化借用。恰恰在 11、12 世纪之时,西方所处的区域具备了可资利用的历史条件,从而有利于西方文明的形成。

首先,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荡和痛苦,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封建经济的发展,西方区域具备了文明产生的经济条件,生活在西方区域范围内的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开始融合发展,重建秩序。日耳曼人的传统得到转化和巩固,教会在日耳曼等蛮族统治地域的传教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文明成长于能够产生相当数量经济剩余的经济体。^⑩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地区经济衰退得相当严重,而且最发达的经济领域萧条得最为彻底,货币经济的再度复苏也显得步履迟缓。很长一段时期内,生存下来几乎就是人们唯一的指望,经济倒退使城镇繁荣的地区所剩无几。^⑪所以布罗代尔说:“要想理解这最早的欧洲文明,我们必须记住欧洲罹受的灾难,想象一下 9 和 10 世纪骇人的‘黑暗时代’,认识到整整一个大陆每天都必须为生存而斗争的压倒一切的贫穷。”^⑫到 11 世纪,西欧经济才逐步扩张,贸易和城市生活逐步恢复活力,具备了产生新文明和新文化的基础。

在动荡的局势下,日耳曼诸王国在过去部落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发展新的传统和统治方式,

特别是法兰克王国,曾经一度出现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局面。亚琛的宫廷活跃着一些爱尔兰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其中阿尔昆的突出地位见证了欧洲文化重心从古典世界向北方的转移。虽然出现了世俗人士艾因哈德撰写的皇帝生平记,但“加洛林文艺复兴是一场毫无疑问的基督教复兴,除了训练教士、提高法兰克教会的水平、将信仰带往东方以外,没有其他目的”。^⑭作为国际性宗教组织,基督教教会是当时保有知识和协助世俗国王治理国家的主要力量,但是直到11、12世纪,在西方文明的空间区域内,基督教化过程才基本完成。“到公元1000年,基督教还是赢得了数量可观且日益增长的信众。”^⑮至11世纪,天主教会才确立了在精神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从基督教会本身的发展来看,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天主教正式成为西方文明精神交往的旗帜,成为宗教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威。通过区域内统一的从上至下的天主教会组织,以及修道院、大学等知识场所,西方文明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场域。^⑯

其次,作为罗马帝国的直接继承人,拜占庭帝国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不时地试图重建罗马帝国的权威和恢复帝国疆域。拜占庭帝国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和巩固长期的征服活动,但拜占庭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为西欧准备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使得西欧地区能够随时借用。

从6世纪到11世纪,西欧的罗马法一般指的是所谓的蛮族法典,特别是西哥特人的罗马法,这些法律不是古典时代的罗马法,而是5世纪的平民法(vulgar law)。此时由职业法官组成的法院体系消失了。在西欧,地方自由民群体寻求以对共同体生活干扰最小化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自由民大会确立与安全相关的惯例,这些惯例并不会被僵化运用,而是提供了解决争议的背景,争议的解决通常是通过妥协而实现。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不是感到属于一个世界帝国,而更多的是感觉属于具有相似种族起源的共同体人群的一部分,这些人具有相似的传统习惯。^⑰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西欧要建立自己的法律体系,必须向周边地区借鉴经验,而拜占庭帝国正是一个绝佳的借鉴对象。作为罗马帝国的直系继承人,拜占庭帝国在控制意大利部分地区期间,将拉文纳作为其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首府,在那里留下了美轮美奂的拜占庭艺术和建筑。但拜占庭的最大遗产就是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整理完成的罗马法。这部现称《罗马民法大全》的法典,由《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纂》《法理概要》《新法典》等四部法律文献构成,用拉丁语书写。^⑱这部集罗马法之大成的法典编成后虽然在拜占庭获得关注较少,但从收集和保存罗马法的贡献来说,如何强调也不过分,其作为最准确的罗马法典,为西欧所谓的“罗马法复兴”提供了条件。

最后,如果要论对西方文明起源的功劳,阿拉伯世界可谓居功至伟。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不仅改变了地缘政治版图,还为西方世界居间传播古希腊的经典和东方技术准备好了条件。

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时期,出现了翻译古希腊医术、数学、天文学、哲学等各类经书的风气。在随后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哈里发马蒙甚至在巴格达建立了一所学校,并配备了图书馆和专门的负责机构,使翻译古希腊经典变成了国家鼓励的有组织的活动。这一大规模的翻译工程“所翻译的希腊典籍,范围颇为广泛”,“翻译与否的取舍标准是教育性,译自希腊文的阿拉伯文译本首重两个领域——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译本,包含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作品,还有许多古代哲学家,包括新柏拉图派、诺替斯教徒和炼金术士的著作。此外,还有医学、占星学和天文学、炼金术和化学、物理和数学等”。^⑲阿拉伯世界的翻译活动为古希腊知识传到西欧提供了条件。此外,伊斯兰世界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为把东方技术文明传播到西方提供了基础。

总之,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的形成,不是对古典文化的复兴,因为西方文明不是古典文明的继承或延续,彼得·N.斯特恩斯就看到:“西欧和古希腊的关系就像日本和古中国的关系:一位(文



化的)深度借用者(heavy borrower),但明显不是直系文明继承者。”^⑮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基督教持续影响的结果,是日耳曼诸王国不同传统杂糅整合累积而成的结果,也是借用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世界文化成果的结果。

西方文化基因的雏形阶段

11世纪至14世纪,是西方文化基因形成的雏形阶段。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三大文化基因都崭露头角。

第一,西方文明借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基因。西方通过借用古希腊哲学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术语和逻辑思维体系,形成了西方文化的概念和思维方式;通过借用古罗马的法律体系和概念来塑造西方文化的法律概念;通过借助从东方传来的技术,形成了西方文化的技术文明。最终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思考原则和知识生成原则得以确立。

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欧洲在一连几个世纪遭受野蛮部落的蹂躏之后,必须重建自己的文化,但在缓慢而艰苦地重建文化的过程中,直到12世纪人们才能得到残留的文献,获得的文献又有许多是当时的学者看不懂的,或者译文很糟糕。^⑯幸运的是,阿拉伯世界的阿拔斯王朝“带来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盖伦”的著作翻译为阿拉伯文。^⑰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世界还涌现出一批对古希腊哲学进行了精深研究的注疏家,如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注疏,帮助经院学者深化了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正是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经院哲学家重构了他们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理性思辨模式。“早期经院哲学家根据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规则,采用严谨的方法研究道德、神学和哲学问题。”^⑱

因此,不管经院哲学的论题多么荒谬(比如“一个针头上能站多少个天使”),这样的辩驳和诘难训练了当时知识人的逻辑思维。当时著名的经院学者都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原则参与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比如,在“11世纪,安瑟尔谟这样的神学家用来构建自己理性的原始材料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⑲在讨论过程中,“基督徒学者引入了辩证推理的方法,这也是经院哲学的一个特色”。此外,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个异教徒,“基督徒学者必须将亚里士多德纳入自己的体系”。^⑳比如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与基督信仰结合,建立了一套立论清晰、理据渊博、辩证彻底的神学理论去演绎生命的意义和目的”。^㉑格拉提安编纂《教会法汇要》这部著作时使用的辩证理性分析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㉒

西方法律文化的形成是借用古罗马法律概念和体系的结果。伯尔曼认为:“以公元1100年或1150年的眼光来看,公元1000年北欧和西欧各民族的民俗法显得相当原始……没有把法律作为一种不同于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的概念。”^㉓促使中世纪法律研究成形的重要事件有三个:一是11世纪的学者们重新获得了6世纪时查士丁尼皇帝下令编纂的罗马法原始文本;二是主教叙任权之争;三是法学院在博洛尼亚的建立。^㉔只是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早期及此后,各种法律体系才首次在罗马天主教会和西欧各王国、城市及其他世俗政治体中被创立出来。11世纪西方人在意大利一家图书馆发现了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虽然查士丁尼的汇编并不具现行的效力,例如其中有关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就与1100年托斯卡纳或诺曼底现行的封建财产权的调整毫无关系”,但是“罗马法给全欧洲(包括英格兰)提供了大量基本的法律词汇”^㉕和法律概念,帮助西欧实现了法律的体系化。因此,查士丁尼对罗马法的法典化为西方文明作出了持久的贡献。^㉖

西方文化的技术文明是在理性主义和实用需求结合下借鉴东方文明的成果而形成的。艾哈迈德·伊萨认为穆斯林学者拯救了几个世纪遗失的知识,伊斯兰世界是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桥梁。^③根据约翰·霍布森的考证,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是意大利人开创了一系列金融制度和技术,如合约经营、汇票、借贷制度、保险和银行等,但实际上这些制度和技术或起源于伊斯兰时期的中东,或起源于前伊斯兰时期的中东。先进的会计制度源于东方。航海革命依赖星盘、罗盘、斜挂大三角帆、船尾方向舵和方形船体的使用,这些让欧洲人走向海洋的技术突破,绝大多数是在东方诞生的,并都是在东方得到改进和完善的,约1180年通过伊斯兰世界向西传入欧洲。水车、风车和一系列纺织、造纸技术都是由东方传到欧洲的。最后,欧洲的铸铁技术和钟表制造技术也是由中国经伊斯兰世界传入的。^④

第二,基督教文化正式成为西方文化的基因和底色。在经历几个世纪的传教后,基督教才在西方社会站稳脚跟,开始全面影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形式,逐渐内化为西方文明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基督教作为西欧地区的外来宗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被罗马帝国接受,其后被诸蛮族王国接受的历程更是曲折,哈罗德·伯尔曼指出,西方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一种文明,是吸收和采纳“以色列”“古希腊”“古罗马”这些精神原型而形成的。^⑤西方文明对基督教的采纳和利用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变迁。虽然“西方基督教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欧洲思想主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的整个历史上,基督教一直是其文明的中心”,^⑥但我们要认识到,基督教在5—11世纪才逐渐传遍西欧,在奥古斯丁之后的600多年时间里,“西方教会在神学创新上鲜有贡献,并且也没有神学巨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现过。许多的神学辩论,都是围绕着奥古斯丁的诠释打转”。^⑦此外,为适应诸日耳曼王国的传教新环境,“在日耳曼诸民族基督教化的同时,基督教也日耳曼化了”。^⑧11世纪基督教教会在西欧地区扎根以后,特别是标志着西方文明精神标识出现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以后,教会在西方文明的起源进程中才逐渐凝聚为文化基因之一。

教会成为西欧社会日常生活的核心,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内在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的内核。教会在西方文明起源之初,成为笼盖四野的宗教组织,宗教生活开始凝聚为文化基因,因为“日复一日的劝诫、教诲、婚嫁、施洗、忏悔和祈祷,包含世俗教士与普通信徒的所有宗教生活……利用这种状况,教会给一个野蛮人的世界带来文明”。^⑨宗教因素渗透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宗教节日、周日弥撒、洗礼、婚礼和葬礼都让农民与村庄教堂联系在一起,成为庄园生活至关重要的一部分。^⑩贝内特指出,“对于中世纪的农民而言,教会比我们习惯上理解的要重要得多……无论是在田间还是在家里,也不管是在森林边劳作或是推着粮食去附近的磨坊,无时无刻不笼罩着宗教的氛围”。^⑪

教会人士作为当时文化的提供者和垄断者,参与日耳曼诸王国的治理,协助整理日耳曼的习惯法,为政府提供各种文书服务。尽管教会在乱世之中也试图保存文化火种,但收效不彰,只有到了经院哲学兴起,借助古希腊哲学发展出理性思辨工具,才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础。在罗马文明逐渐化为历史云烟的过程中,“教士与非文盲、文盲与非教士本质上属于同义词。过去的罗马人可以将法律写在铜板上,置于公共场所,对于公民的阅读能力毫不担心;可到了中世纪的中后期,就连国王都普遍不识字。教士实质上垄断了所有此类文书事宜”,导致的结果是“文化不仅与宗教有关,更以压倒一切的宗教前提为唯一的土壤”。^⑫由于野蛮人的入侵和早期基督教会避世灵修的顽冥态度,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遭到可怕的打击和削弱,“古典时期思想家的伦理



观念通过文字流传到中世纪早期和中期,但许多观念是与基督教信条不相符的……此外,许多本可以表现古典思想多样性,揭示古典文化与基督教信仰兼容性的文献,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修道院图书馆里是看不到的”。^④到10世纪,往昔古典世界的遗产才被教会人士保护起来,本笃会和宫廷学院的誊抄员,不仅誊抄《圣经》,而且誊抄关于希腊学术的拉丁文文集,“通过他们所抄写的普林尼和波伊提乌著述,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与属于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的时代建立起了细若游丝的联系”。^⑤这是西欧借用古典文化的另一条密道,但也是一条羊肠小道,行人稀少。教会思想家除了广泛吸收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外,“还将柏拉图作品中的许多内容据为己用,提炼其中的寓意,使其更容易被人接受”。^⑥

西方宗教文化基因的出现还体现在当时兴起的知识教育机构——各类学院和大学中。“这些教育机构,不管是大学还是本地的学院,基本上都只对男性开放,而且全是基督教机构”,到了12世纪晚期,“城镇知识界深受大学(universities)的影响。大部分大学都是从学院发展而来的,也或多或少受教会的控制”。^⑦虽然从12世纪起在修道院之外开始出现医生、律师等世俗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中世纪大学师生都是教士。^⑧更重要的是,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学校与大学产生了一种新的神学——经院哲学,其代表一种特殊的神学方法,认为人类的理智可以为人类能想到的所有问题找到答案,人类的理智是取得知识的途径,甚至在神学中也是这样;其对于寻找非基督教哲学与神圣启示间的正确关系,怀着巨大的兴趣;其使用一种特定的教学和写作风格,并且用一种辩证法来讨论。^⑨经院哲学的出现,标志着理性主义在西方知识生产领域生根发芽。

第三,通过继承发展日耳曼等“蛮族”的传统,西方形成了经验主义的行事方式和俗世文学艺术的发展原则,在日耳曼传统积累和城市生活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主义的萌芽。个人主义成为西方的第三大文化基因。

日耳曼诸王国立国之后,统治着全新领地,面临着全新形势,要解决这些治理问题,只能从原始部落传统出发,结合不断征战的需要,形成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下,“领主从国王(他的封君)那里,或者从一个地位比他本人要高的领主那里得到采邑(feodum)或领地。作为封臣,他反过来要向其领主提供一系列服务”。^⑩正是从这种封建契约关系中,西方形成了一整套社会等级关系和新的惯例,形成了依靠惯例来裁决事务的经验主义的行事方式。

从11世纪起,西欧的商业进入复兴时期。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商业复兴直接相关,城市沿着商业传播所经过的一切天然道路出现。^⑪交换经济的主体是个人,富裕农民和城市市民的主体性不断增大。社会学家西美尔阐述了西方人获得人身自由的过程,指出其只有当货币租税取代了实物租税才会出现,而“日耳曼农民的农役租佃和实物租税向货币缴租转化的过程自12世纪以降就开始了”。^⑫随着城市的兴起,还出现了一个封建制度之外的产物,那就是市民阶级,“市镇居民通常对他们的新生活方式拥有巨大的热情”。^⑬马克·布洛赫指出,法语市民(bourgeois)一词被用作骑士、教士和农奴等词的明确的反义词。当时的人认识到,城镇的主要特点是居住着一群特殊类型的人:“从本质上看,市民是以经营商业为生。他们从买卖差价或借出与还回的资金差额中获取生计费。由于这种居间牟利的合法性——除非只涉及工人和运输工的工资——遭到神学家的否认,其性质为骑士社会所误解,所以他们的行为规则与盛行的道德准则发生明显的冲突……这个社会所创立的各种制度中几乎每件事情都使他们焦恼不安、烦躁不已,他们在这一社会中仍然还处于非常微末的地位。虽然他们以暴力手段赢得或以金钱购买到特许权,并且为了实施必要的报复和经济扩张而组织和武装起来,但他们渴

望建立的城镇却仿佛是封建社会的异物。”^{⑤1}城市生活意味着自由,“市民阶级之所以在几个世纪中以特别关切的心情守护着这些特许状,藏诸保险柜加上三道锁,而且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尊敬对待它们,那是因为特许状是他们的自由的保护神”。^{⑤2}

随着城镇的增多、市民社会的扩张、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个人主义逐渐萌芽。西方文明的诸多特征可归因于个人主义意识的出现和一种市民社会中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传统。^{⑤3}封建制度下发展出来的骑士精神,农本经济的繁荣、商业和城市的复兴孕育出的俗世文化,都是这种个人主义意识萌芽的体现,表现为“以《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为代表的‘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兰斯洛特(Lancelot)这样的浪漫化英雄形象、精美的装饰手抄本、德意志吟游诗人和他们的歌曲,还有壮丽的大教堂和其中的音乐及仪式”。^{⑤4}

西方文化基因雏形出现的标志就是所谓的“12世纪文艺复兴”。“在这一世纪,罗马式艺术登峰造极,哥特式艺术萌芽初露,方言文学蓬勃兴起,拉丁经典著作、拉丁诗歌和罗马法复兴,吸收了阿拉伯因素的希腊科学、大量希腊哲学复苏,第一批欧洲大学创立。在高等教育、经院哲学、欧洲法律体系、建筑和雕刻、礼拜仪式戏剧、拉丁和方言诗歌方面,12世纪留下自己的印记。”^{⑤5}这种文化繁荣景象正是西方文明三大文化基因初露峥嵘的结果。

西方文化基因的发展阶段

西方文明文化基因形成的第二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创造的一个概念,指代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重生,但这种想法只是西方文化人士在西方文明成熟时建构起的西方文明叙事“神话”,^{⑤6}“文艺复兴”作为一场精英文化运动,^{⑤7}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文化“重生”或“复兴”,只有西方文明为了构建本身文化基因而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大规模借用。

这一历史时期,在所谓的“12世纪文艺复兴”的基础上,日耳曼的传统借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黑死病肆虐的催动进一步演进。随着市场和城市因素的扩展,市民社会的需求和心声亟须得到回应,“文艺复兴”进一步借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艺术作品的原则、概念和术语,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宗教信仰概念体系;进一步借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想象方式,来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艺体系;进一步借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历史典故和艺术形象,从而在一个没有厚重历史的文化环境中,创造自己的历史意象和艺术源泉。在这一过程中,“搜寻古代文本,不仅通过搜寻的东西,而且通过搜寻的方式,训练了人们的批判思维”。^{⑤8}理性主义由此进一步抬头,基督教文化发展,个人主义得到彰显,西方文化三大基因的根基得到稳固。

首先,“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作品的大规模直接模仿,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模仿,即使没有原型,也要想尽办法创造出符合古风风格。

“文艺复兴”始于意大利,有着深厚的内在原因。在建筑上,古典形式的复兴从平面图到装饰细节均十分明显,因为只有意大利才有许多古典建筑保存下来,包括万神殿、大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和马塞卢斯剧院,这些现成的建筑成为方便意大利建筑师学习和借鉴的对象。雕塑也可以借鉴古典原型,绘画无法模仿古代作品,但可以使用间接的方法,那就是让人物摆好姿势,处于著名的古典雕塑之中,或试图按照文学作品的描述重绘失传的古代绘画;在音乐中,人们试图以文学资料即古典专著为基础重现古代风格;肖像画则模仿罗马硬币上皇帝的头像,或古代大



理石半身雕像。^⑤

“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中世纪学者，只能借助阿拉伯典籍来了解古希腊哲学、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等知识，因为他们大多数不懂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知识人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到处搜寻古物，在欧洲的修道院图书馆和没落的拜占庭帝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搜集到了古典时代的文学、历史和演说文献。这些文献大多用拉丁语或古希腊语写成，“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其中文学和历史等文化方面的文献十分感兴趣，将其作为新的研究重点。彼得拉克、尼科利及布拉乔利尼等“文艺复兴”学者，为了搜寻诸如西塞罗、李维等希腊语拉丁语作家的著作而找遍了欧洲各大图书馆。“虽然古典的遗产进入了西方中世纪的生活、语言和思想习惯，但古典文学和古典诗人、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往往不再激起人们的热情，甚至不再引起人们对知识的兴趣。虽然拉丁语仍然是一门活的语言，但希腊语现在几乎不为人所知。在最优秀的图书馆中，古典作品的手稿上落满了尘土，无人去翻阅它们，为人们遗忘了。人文主义者到处寻找这些文献，重新阅读它们，对它们进行编辑，添加上他们自己的充满激情的评注，借此激起公众对这些作品以及他们此后生活于其中的古典古代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尊崇。”^⑥詹姆斯·汉南认为，将希腊语重新引入西欧是人文主义者不容抹杀的积极贡献，在古希腊遗产缺席千年之后，单是翻译对西方人来说已经不够，他们想要汲取原汁原味的希腊文学的泉水。^⑦而彼得·伯克认为，这个时期“再生的”或“复活的”主要语言是古典拉丁语，中古拉丁语在词汇、拼写、句法等方面开始被认为是“不规范的”，15世纪40年代的学者洛伦佐·瓦拉写道：“许多世纪以来，不仅没有人会正确地说拉丁语，而且甚至没有人在阅读时能准确地理解它的意思。”而在瓦拉的时代，能像西塞罗那样会写拉丁语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奢望。^⑧

“文艺复兴”这场运动的特别之处是全心全意地试图复兴另一种文化，在如此之多的不同领域、以如此之多的不同手段去模仿古代，比如这些学者使古罗马主要的文学类型——史诗、喜剧、颂歌、牧歌等得以复活。^⑨这正说明了借用其他文化创造自身文化基因的手法。

其次，“文艺复兴”是整个西欧的历史文化现象，是重塑西方文化基因的整体行动，虽然时间上有先后、内容上千差万别。

“文艺复兴”遍至西欧各国，它并非单纯的古典复兴，实际上是在借用基础上的文化创造。“文艺复兴”主要表现为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普遍高涨，但各国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带有各自的特征。1450年以后，“文艺复兴”开始向北扩散，北方“文艺复兴”更多地显示出宗教特征，由于封建君主的韧性，政治变迁不那么明显。^⑩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潮流逐渐向西北欧扩散，影响所及，西欧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表现趋于一致，相互激荡促进。人们认为14和15世纪的欧洲在表现现实主义方面是一致的，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乔叟的作品和《玫瑰传奇》的第二部分里得到证实。在15世纪的绘画中有一股由北向南的影响潮流，意大利人从佛莱明画派中也学到了很多——明朗的写实风格，更为生动的情绪表现和更高的技巧。^⑪彼得·伯克也指出，意大利不是文化革新的唯一场所，比如在15世纪早期的荷兰，扬·范·爱克、罗格·范·德·韦登等人发展了油画新技术，这种技术在意大利极受重视且产生影响；在音乐方面，荷兰甚至被意大利人认为是圣地，一位意大利作家说道，音乐上的多那太罗是约翰内斯·欧克赫姆，而音乐上的米开朗琪罗则是若斯·德普雷，主要的艺术家和作家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汉斯·霍尔拜因、伊拉斯谟、蒙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而激发灵感。^⑫可见，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上的相互影响相当明显，文化共相进一步显现。

最后,“文艺复兴”的主要贡献是在西方文明文化基因形成的关键阶段,推进了西方文化基因的发展重塑,特别是推进了人文主义的发展,为宗教观念转型和下一历史阶段西方文化基因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不管“文艺复兴”的表现形式有多少不同,其总体特征都是通过借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刚刚诞生的西方文明“抄作业”,通过普及人文主义逐步发展自己的文化基因。彼得·盖伊也看到了这一点,指出这里复兴的不仅仅是文学,“人文主义者对形式的偏好,对真正的古典文本的搜寻,乃是思想风格发生变化的前提条件”,他还引用吉本对“先模仿才能超越先辈作品”的强调,指出文艺复兴的本质是对古代文化的模仿。^⑦

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两大特征。^⑧这场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文艺和学术运动抛弃了把人视为令人憎恶的有罪者、因此要求他们在上帝面前卑躬屈膝的理论教条,开始以人为本,把人视为创造的巅峰、自然的主人、世界的奇迹。^⑨人文主义被研究者视为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和贡献。在布克哈特看来,人文主义者是沟通古今的桥梁,他们是一种新型人物,是和中世纪文化进行坚决斗争的战士,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都以精通古典文化而闻名,都是现代意大利文化的缔造者。粉碎了中世纪的精神枷锁之后,意大利人不但发现了世界,还发现了自己。因此,布克哈特认为,个人主义是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而且“文艺复兴”的各方面都是个人主义的表现。^⑩彼得·伯克认为布克哈特所作的“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的对比太激进,一方面他低估了中世纪特别是从12世纪起对个体自我关注的重视,另一方面他夸大了15、16世纪期间这种关注的重要性。^⑪虽然布克哈特将“文艺复兴”视为与中世纪断裂的观点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驳,但他关于人文主义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观点却是一针见血的。

由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并不是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样是完全彻底的断裂。文艺复兴并非处在与中世纪哲学相对的一极,尽管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哲学大加嘲讽,但布罗代尔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不是对基督教的一个打击呢?能不能把它视为朝向无神论或不信宗教的一个运动?或者,应不应当至少把马基雅弗利、拉伯雷或者蒙田歌颂为自由思想的名副其实的先驱?”对此的答案是,“这么做可能就过于根据现在的标准来判断文艺复兴了。它逆转了经院哲学和神学的传统教导,这是确确实实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它喜爱完全属于异教的古典文学,它的思想趋势是提升人性”。^⑫布罗代尔的判断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人文主义者的圈子虽然相对不大,但他们的影响绝不限于少数城市或者金碧辉煌的王宫。人文主义者分散在欧洲各地,通过大量书信互相联系起来,整个欧洲都受到了人文主义现象的影响:从意大利开始,包括法国、德意志、匈牙利、波兰、尼德兰、英国等。^⑬当然也要看到,人文主义并不是世俗化运动,相反,它反对的是高高在上统治一千年之久的奥古斯丁主义者对于人性所持有的悲观态度。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具有特殊的异教味道,因为当地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回溯到基督之前的古希腊泉源,去寻找灵感;在莱茵河流域,人文主义保留了基督教色彩,尽管他们扬弃经院哲学,甚至公开反对奥古斯丁认为原罪是人类全然堕落看法。欧洲北部的“文艺复兴”促使神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全面改革,并且最终对新教的宗教改革产生了重要贡献。^⑭

西方文化基因的成熟阶段

进入西方文化基因形成的第三阶段,西方文化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大规模文化借用的基础上,



实现了文化的范式转移。宗教改革改造了西方文化的宗教底色，科学革命彻底重组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启蒙运动解放了个人主义。西方人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借用来嫁接文化基因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古今之争凸显了西方文化重新看待其与所借用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西方文化基因成熟后的文化自信。总之，西方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从根本上得以重新塑造，文化基因最终定型。

毫无疑问，西方文明所在区域在世界上的地位从15世纪晚期开始急剧变迁，这种变化开始于对非洲海岸和跨大西洋的航海“发现”，西方的性质本身由此开始显著变化。^⑤“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人“把地中海地区当作宇宙中心的偏狭世界观，被跨海远洋航行的壮举打破；种种陌生怪异的文化引发了对异教徒的心灵世界和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的追问探讨……政治家、冒险家、商人、学者以及宗教改革家都向欧洲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至少在激烈程度和广度上是超越以往的”。^⑥再加上印刷术的发明，这些因素使西方出现了一次文化领域的革命。从1465年到1470年，西塞罗的多数著作和贺拉斯的全部作品都上市了。到1500年，维吉尔、奥维德、塞涅卡的作品已经在数十个城市印制了许多版本。^⑦西方文化基因成熟的条件出现了。

首先，新教的宗教改革使西方基督教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转型为现代宗教。从1520年开始，没有任何单一教会可以统一西方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基督教国度已经寿终正寝。在中世纪整合的以罗马为总部的教会，现在已经消逝无踪。^⑧

从神学发展层面来说，伊拉斯谟拉开了神学改革的序幕。“流行的格言说：‘路德孵出伊拉斯谟所下的蛋。’当然，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并非只有伊拉斯谟一人生出改革神学与教会生活的蛋。奥卡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他的角色，威克里夫也一样。其他更小的人物，一定也有很多贡献。但是，虽然伊拉斯谟是一位改革者，但马丁·路德则超过改革者——他是一位革命家。他颠覆了世界。虽然伊拉斯谟医师，想要对教会做精微的、几乎不会碰到神学命脉的小手术，路德医师则执行包括截肢和重建在内的大手术，使病人痊愈后判若两人”，所以，奥卡姆、威克里夫和伊拉斯谟，都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与新教主义之间的桥梁，当然“在宗教改革过程中，这个桥梁就逐渐功成身退，使新教神学一旦建立起来，就脱胎换骨，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很少甚至没有真正相似的地方”。^⑨

从现实生活层面来说，中世纪以来，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天主教会深受侵蚀，教士群体腐败行为盛行，再加上黑死病，给西方人的信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黑死病导致大量神父死亡，教会不得不放宽标准，结果是短时期内大量俗人涌进神职阶层，许多人根本不识字，即使是能阅读的人，也对所读的东西不理解。^⑩再加上教会地产和其他财产增多，让最基层的教会人士都卷入商业活动之中。^⑪改革教会势在必行。宗教改革在西方文明演进进程中的作用是重绘了西方的宗教底色，让宗教更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个人主义崛起的现实生活需求。

其次，科学革命改造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让西方人转向科学思维。“很快普及化的科学革命，减少了对宗教的信仰，并且鼓励以新方式思考问题的意愿。”^⑫培根和笛卡尔都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前驱，培根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的数学理性，两者交汇奠定了科学理性思维的基础。“对大自然的研究，尤其是天文学和力学快速地而且加速度地成长为自成一体的事业，到牛顿的时代，科学已经成功地证明自身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研究领域……在自身逻辑的推动下，科学开始割断与哲学的联系，并且先是要与神学平起平坐，然后逐渐对神学怒目相视。”^⑬

科学革命建立在中世纪科学基础之上（经此也建立在阿拉伯科学之上），建立在“文艺复兴”对世俗主题的兴趣之上，尽管它和“文艺复兴”聚焦于艺术和文学完全不同，新的科学发现特别

是关于行星运动的新发现，导致科学方法和世界观的全面伸张，很快其影响外溢到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调查的发轫。^④科学革命的胜利主要是由当时的科学家赢得的。培根指出，人类应该“开始全面重建科学、艺术以及全部人类知识”，在科学革命的伟大时代，普普通通的人也能认识到科学革命是一桩异乎寻常的事件。这场革命显然是自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发生的一场影响至为深远的剧变，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伽利略、波义耳和牛顿的发现比路德和加尔文的教义更为彻底地改变了世界。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壮观的知识征服，激发起许多人对科学的兴趣。^⑤科学家的进步观开始取代循环论。新的进步心态的中心是培根式的信念：人类能够操控自然，自然的内在发展可以通过人类的干预得到加速，通过真正的知识，人类为了实用的目的，有可能改造自然和物质。^⑥与此同时，科学知识开始向全社会传播，“学术团体和杂志的出现，使新科学家能够互相交流思想，向更为广阔的、识字的大众传播科学知识”。^⑦

最后，启蒙运动解放了个人主义并实现了自由思想。启蒙运动继续了个人主义的扩展之路，西方哲学家一般把17世纪视为大分裂时代，从此理性成为自我决定的个人的基石。^⑧到启蒙运动时代，“它不再是中世纪的延续，因为它也创造出新的机制，建立了与古代的新关系”，所以“启蒙哲人把文艺复兴视为一出宏大戏剧的第一幕，而启蒙运动本身则是最后一幕。这出宏大的戏剧就是欧洲心灵的苏醒”，可以说，“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文化批判家、宗教怀疑者、政治改革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完全没有组织的联盟。这些启蒙哲人构成了一个喧闹的大合唱……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要求把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正是这一声明以及启蒙哲人对这一声明的同气相求，使得启蒙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⑨

西方文化人有一个从自比古人到自我认同的过程。近代早期，人们开始对各种各样的知识产生怀疑，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当时欧洲重要思想趋势之一，除了哲学思想层面的怀疑主义，在实践层面出现了实用主义怀疑论，古人的权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而在大学或其他地方，“知识权威”更是如此。^⑩古今之争是西方文化自我认同形成的标志。启蒙哲人通过消化他们继承的两种遗产——基督教遗产和异教遗产，从而确立自身的独立。从马基雅维利到培尔，这些学者们主要教导了启蒙哲人一件事，即如何占有历史的同时又不丧失自己的个性。马基雅维利阅读了罗马作家的著作后并没有鹦鹉学舌，他是在与李维、塔西佗和波利比乌斯进行持续密切对话的过程中写下《李维论》和《君主论》的，与此同时他也高傲地宣布自己的原创性。蒙田与古典作品朝夕相处，与自己钟爱的罗马人讨论问题，并认为这是一种平等的对话，是通向自立的途径，“我们把别人的看法和知识置于自己的呵护之下，仅此而已。可是，我们应该把它们变成我们自己的”，说到底，“肚子里塞满了食物却不进行消化，不把它们转化成我们身体里的东西，不能用来强身健体，那有什么用呢？”^⑪

对于启蒙哲人来说，走向自身的文化独立之路，需要经过古人。因为自西方文明起源之初，西方文人就是从他们珍爱的古典作品中获取营养，这种营养已经滋养了他们几百年，已经为他们培养出较为强健的文化体魄，从而为他们的文化独立准备了条件。在展开争取现代性的战斗之初，洛克就坚持认为，“古代和历史”是获得知识的障碍，“只是用于给人提供故事和谈资”，而不能教会人们“关于更好生活的艺术”，不能提供“智慧和远见”。启蒙哲人则更为笃定，吉本警告人们不要对古人卑躬屈膝、盲目崇拜，而是应该把“自然和古代”当作“两个伟大的知识来源”。狄德罗说得更准确一些：“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研究古代，是为了学习如何观看自然。”^⑫



由此可见,古今之争重建了西方文明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基础。彼得·盖伊指出,17世纪末古今之争使得诗人和哲学家们群情激昂,但今人派的胜利主要取决于科学论战而不是文学论战,因为“如果说启蒙哲人所尊敬的17世纪前辈中许多人是依据古典学说来建立自己的激进哲学,那么还有一些可敬的前辈则是从相反的努力中,亦即,从对古人的否定中获得自己的力量。自然哲学家既听命于科学规则的要求,也因新发现、新工具以及自由的国际信息交流而感到亢奋,因此自命为新人类、自称是前无古人的开路先锋”。^⑧启蒙运动相信牛顿的新科学方法能够用来发现主宰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自然规律,^⑨透露出西方文化基因成熟后的自信。通过古今之争,西方文化重构了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基础,加厚和巩固了西方文化三大基因的底座。

结语

通过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西方文化基因正式形成。随着西方文化因素的成熟和展开,西方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开始彰显,那就是西方文化的二元性、焦虑性和排他性。

西方文化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多重因素的共存或对立,比如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善与恶(上帝与魔鬼)、此岸与彼岸、正统与异端、灵魂与肉体、自我与他者等。为了确立现代性,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就形成了中世纪/文艺复兴、黑暗时代/觉醒时代、迷信/理性、团体/个人、落后/进步等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⑩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例,两者自中世纪以来逐渐发展为西方人认识论的基础,到了近代早期,“洛克的经验主义知识论以官能(senses)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官能加上反思得出理念:外界事物刺激官能,带来感知;这些外部而来的感知刺激脑袋的内部官能,使它作出组合、比较、抽象等,带来理念。这与笛卡尔的求真方法不同,但没有根本的冲突。笛卡尔知道理念虽然独立于经验,但也是要由经验引发。笛卡尔并没有反对经验,他只是认为经验所得的真或伪,要经理性去分辨,而理性又是以直觉最可靠(洛克对直觉的定义与笛卡尔很像)。也就是说,思想的能力加诸官能的觉察才能得出真知”。^⑪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是借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框架发展而来,经验主义则是从日耳曼诸种族的日常生活习惯演化而来,它们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两条核心因素。所以有学者把经验主义视为英国的文化要素,把理性主义视为法国的文化要素,将两者对立起来,明显是过分夸大了这两种认识方式的民族性。科学理性主义固然带来了工业革命的历史性突破和物质世界的丰富,但西方不但用其理论方法来解决自然问题,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生态和环境危机,而且用它的理论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处的问题,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文明间的冲突。

从蛮族入侵开始,西方所在的区域一直处于危机四伏的周边环境之中,因此西方文化形成过程中对于其他文明有着深入骨髓的恐惧与焦虑,“和外部威胁与内部焦虑与恐惧的斗争在人类文明的产生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⑫在西方文化基因形成的过程中,蒙古帝国的铁蹄、奥斯曼帝国的兵临城下,都曾让西方人恐惧战栗。“西方文明”完全是一个现代概念,其本身经历了一个知识学的建构过程。这一概念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意味着在文明类型上存在着一个对立异质的“他者”,“他者”的存在始终伴随着西方文明的诞生和发展,这个“他者”就是“东方文明”。正是这种威胁和焦虑,推动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内部认同和与其他文明的外部区分。^⑬在西方文明兴起的15—18世纪,传统观点认为此时是欧洲的扩张期,西欧强国拥有优越的军事力量,因此欧洲扩张主要是欧洲国家和军队打败海外对手的结果,欧洲人更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但J.C.沙曼

指出,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一半以上的时间里,的确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只不过它不是掌控在西方人手里。相反,欧洲列国与亚洲大国如莫卧儿帝国和中国的明清王朝相比微不足道。^⑨即使在西方文明内部,因为宗教异端观念的存在,对异端的恐惧和焦虑也一直是西方文化的特点,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对异端包括对犹太人一直持不宽容甚至血腥攻击的态度,^⑩这和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恐惧与焦虑叠加在一起,加深了西方文明的焦虑特性。

正是西方文化的焦虑性,导致了西方文化中排他性特质的产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非西方文明的排斥。这使得西方文明总是试图战胜自己的敌人,如果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一个出来。彼得·N.斯特恩斯把西方文明长期以来敌视外来者看作西方文明的缺陷,^⑪但这种所谓的缺陷无疑是西方文明的文化特质之一。西方文化的这种排他性“导致了一种西方的傲慢,贬低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作用”。^⑫西方文化的排他性是建立在文化优越感之上的,正是这种优越感让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西方文明把殖民和征服视为自己的最高道德责任。约翰·霍布森就看到了西方文明的这种排他性和进攻性,因为它通过“把东方定义为劣等的、不能自我发展的(文明),与此同时,把西方认同定义为独立的、积极主动的和父亲般的(文明),很自然把帝国主义规定为一种道德责任(也就是西方文明负有文明化东方的任务)”。^⑬到了20世纪后半期,随着反殖民主义成为世界潮流,帝国主义责任土崩瓦解,西方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是對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⑭这种论调从本质上反映出西方文明的内在文化特性。

西方文化由于起源于文化荒漠,其基因的形成只能通过文化借用和自身生活经验的积累,所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欧社会的文化因素与经济、政治等因素互相影响,形成中的文化基因与兴起中的资本主义互相促进、互相成就,西方文化基因的特征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步步彰显。反者道之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决定了西方文明经常走向自己价值观的反面。这也让西方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相处的过程中充满了虚伪荒谬、心口不一、左右摇摆、前后矛盾等行为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世界上所有文明的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限制西方文明负面特质的肆意发挥,推动西方文明作为发达的文明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Peter N. Sterns,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51, p.52, p.31, p.39, p.69, pp.69-70, p.57, p.76, p.70, p.52, p.132.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J. M. 罗伯茨:《我们世界的历史II:文明的分化》,陈恒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98、134页,第129—130页,第106页,第29页,第128页,第128页,第127—128页。

③ Heather M. Campbell, ed., *The Ascent of the West: from Prehistory through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Britannica

Educational Publishing, 2011, p.122.

④⑤⑬⑮ 李新宽:《西方文明起源时间再认识》,《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⑥⑭⑯ 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69页,第63页,第216页。

⑦ 侯建新:《中世纪与欧洲文明元规则》,《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⑧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37页,第336页,第356页,第338页,第

is necessary for us to emphasize the incentive attributes of Anti-monopoly Law,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On one hand, Anti-monopoly Law in the field of platform economy maintains a moderate application posture. Where the monopoly problem of the platform can be solved by other means, Anti-monopoly Law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intervene.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application of Anti-monopoly Law is essential, the application of exemption system, leniency system, commitment system, and justifiable defence system should also be fully considere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illegality of monopolistic acts.

Keywords: incentive; platform operator; regulation; anti-monopoly; development confidence

The Intrinsic Structure and Effective Construction Framework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Logic of Marx's Practical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Xiao Shiyang

Abstract: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mainstream ideology based on Marx's practical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 the intrinsic structur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ists of three main stages: the primordial starting stage, the sequential intermediate stage, and the completing terminal stage. These stages form an organic and comprehensive whole through progressive integration. The starting stage manifests as the historical prerequisite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long with the imperative normative demands on history. The intermediate stage manifests as the forms of subjectivity,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practices. The terminal stage manifests as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normalized historical reality. The intrinsic structur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generated through the fusion of these stages, presents itself as a complete form, functioning as a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organic whole covering various domains of social history. Thus, the framework for effectiv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s delimited as a specific and effective construction pattern. This pattern, rooted in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for historical possibility, tasks itself with nurturing qualified subjects capable of meeting these demands, forming scientific ideological concepts that recognize and fulfill these demands, and creating objective mechanisms that effectively meet these demands.

Keywords: mainstream ideology; structure; progressive generation; ideological concepts; construction framework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Cultural Borrowing to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Genes

Li Xinkuan

Abstract: When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in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it could be said to be culturally barren and desolate. The formation and shaping of its cultural genes had gone through a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phases. The 11th-14th centuries were the embryonic stag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genes. The Renaissance was the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ese two historical phases belonged to the period of cultural borrowing, with large-scale borrowing of the cultural concepts and cultural imagery of ancient Greece, the legal terminology and even the legal system of ancient Rome and Byzantium, and the technological culture of the Oriental civilization and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Three major cultural genes, namely, rationalism, christianity and individualism, were shaped by appropriating, absorbing, transforming and restructuring these cultural factors, and by combining them with the evolving and re-created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Germanic traditions.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was the stage of matur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stage of cultural cre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hich began to create its own culture.

Keywords: Western civilization; cultural history; cultural genes; cultural borrowing

Interpreting the West through Chinese Perspectives: The American Imaginaries of Chinese Scholar-officials around the First Opium War

Liu Han

Abstract: Before the Opium War, Chinese knowledge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system was scant. With the continuous introduction of missionaries to China, especially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officials who "opened their eyes to the world" after the Opium War to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foreign nations and developing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American system. Moreover, America's history of resistance against British rule resonated strongly with these scholar-officials, especially in the wake of China's defeat in the Opium War. This process is pivotal not only for its historical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erceptions of Western systems but also for providing rich lessons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and area studies. Their endeavors encourage ongoing research to balanc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he pursuit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Keywords: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presidential system; Late Qing intellectual history